

《朱子家礼》研究回顾与展望

周鑫

摘要：《朱子家礼》是中国近世一部重要的儒家礼书。探究《朱子家礼》文本流传与仪节实践也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竞相关注的议题。本文尝试从《朱子家礼》成书之真伪、《朱子家礼》与《书仪》之比较、《朱子家礼》文本之传布、《朱子家礼》祠堂制度之推行与祭祖礼仪之展开四个问题出发，回顾检讨既有研究成果，并就诸问题的未来前景及《朱子家礼》研究的整体方向提出具体参考意见。

关键词：《朱子家礼》 文本流传 仪节实践 祠堂制度 祭祖礼仪

前言

《朱子家礼》（下文简称《家礼》）是中国近世一部重要的儒家礼书。它的流传与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型塑着中国近世儒士的行为性格，而且非常明显地影响着中国近世社会的家庭结构与风俗礼仪。^①探究《家礼》的文本流传与仪节实践亦成为中国近世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竞相关注的议题。目前学界有关《家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流传与仪节实践的五个具体问题上：《家礼》成书之真伪、《家礼》与《书仪》之比较、《家礼》文本之传布、《家礼》祠堂制度之推行与祭祖礼仪之展开、《家礼》丧葬礼仪之践行。有关《家礼》丧葬礼仪践行的研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2009）在《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一书中已有相当精彩的介绍与勾画。本文不揣浅陋，尝试以另外四个问题为中心，回顾检讨既有研究成果，并就诸问题的未来前景及《家礼》研究的整体方向略陈孔见，求教方家同好。

一、《家礼》成书之真伪

《家礼》研究是从辨正《家礼》成书真伪开始的。《家礼》底本的原稿据说在朱子草定不久即遭人窃走，复稿直至其会葬之日方才出现。朱子的亲炙门人廖德明（字子晦，南剑州顺昌人）、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人，1152-1221）、陈淳（字安卿，漳州龙溪人，1153-1217）、杨复（字志仁，福州长溪人）等都没有怀疑复稿的真伪，先后将其整理刊行。元至正年间，武林人应氏首作《家礼辨》揭橥《家礼》非文公所编。明儒丘濬（字仲深，海南琼山人，1421-1495）见过《家礼辨》，他在成化十年（1474年）编订的《文公家礼仪节》中摘录并批驳应氏之说。丘濬的说法受到清儒王懋竑（字与中，江苏宝应人，1668-1741）的质疑，他先后撰《家礼考》、《家礼后考》力辨《家礼》乃后人伪托。王氏之说得到四库馆臣的附和，却又遭致夏炘（字心伯，安徽当涂人，1789-1871）的责难。迨入近现代，阿部吉雄（1936）、兼永芳之（1958）、钱穆（1971）、高明（1982）、上山春平（1982）、卢仁淑（1983，2000）、樋口勝（1987）、陈来（1989）、束景南（1991，1993）、伊沛霞（Patricia Ebrey，1991）、张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勇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艳春博士、大阪大学博士生申斌先生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① 《家礼》大约在14世纪传入朝鲜、日本。《家礼》在朝鲜、日本的流传与践行亦是海内外学者相当关心的研究领域。惜笔者学识有限，才力不逮，除极具典范意义的研究外，有关《家礼》在朝鲜、日本流传与践行的研究成果本文基本不涉及。

国风(1992)、王燕均(1999)、吾妻重二(1999, 2004)、細谷惠志(2001)、杨志刚(2001)、师琼佩(2002)、粟品孝(2004)、蔡方鹿(2004)、安国楼(2005)、吴明熙(2008)诸学者先后讨论过《家礼》成书真伪问题。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家礼》成书问题依循三种路径展开:第一、整理应氏、丘濬、王懋竑、夏炘诸儒的论说要点,辨明他们史料释读与逻辑推理的正谬得失,判定《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第二、搜罗散落在朱子本人书写的信牍序文、经义著述和朱子门人笔述的语录传记、《家礼》序跋中与朱子家礼思想、家礼行为及家礼著作有关的材料,重建朱子写作《家礼》的思想观念、历史情景,并比读通行本《家礼》礼文,参酌思想变化与情景局限,判断《家礼》哪些内容为朱子原作或后人改易。第三、梳理《家礼》诸版本的传刻系统,比勘其文字异同,追溯《家礼》的原始面貌。

学者们大体确信:《家礼》的底本乃朱子草定,《家礼》的刊本杂有后儒点窜的痕迹。他们讨论的重点亦由考辨《家礼》成书真伪拓展至重建《家礼》成书思想、成书情景与追溯成书底本。但学者们至今没有找到朱子生平明确言及《家礼》的文字(除《家礼序》外),更无法觅到朱子草定的《家礼》底本。如钱穆、上山春平、束景南诸先生找到朱子言及《家礼》的力证是《朱子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书三十九,“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昏丧祭之仪”。但陈来先生业已考证,此应指朱子欲将《乡约》、《乡仪》合并为一,减去冠昏丧祭部分,只存通礼。又上山春平先生自认最重要的证据是《朱子语类》卷九十第109条,“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文稍备”。可文中朱子所说的“诸家礼”,并非《家礼》,而是前贤诸家有关祭礼的礼书。结果无论在《家礼》成书思想、成书情景重建还是《家礼》成书底本追溯上,诸家意见众说纷纭,始终不能定讞。换言之,由于关键史料的缺失,《家礼》成书史本身似已题无剩义。既然如此,我们与其汲汲追问《家礼》成书之真伪、思想、情景或底本,不如尝试重新回到先儒论说《家礼》成书问题的历史现场,审视论说背后的《家礼》成书观及其思想社会意义。

讨论《家礼》成书真伪的学者们似乎很少留意到:从宋嘉定四年(1211年)《家礼》五羊本问世到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家礼》性理大全本竣编的两百年间,儒士在编刻、讨论《家礼》时常常会对《家礼》成书问题表达意见。应氏的《家礼辨》不过是众多意见中走得最远的一种。而自永乐十五年(1417年)《家礼》性理大全本颁行以来,除丘濬、王懋竑等数人外,鲜有人在编刻、讨论《家礼》时理会《家礼》的成书问题,应氏《家礼辨》更是亡佚无存。我们有理由相信,努力建构《家礼》的正统地位与追求《家礼》的完美定本是13至15世纪初的儒士论说《家礼》成书问题的重要动因。也正因为《家礼》的正统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家礼》的礼文仪节诸多窒碍,《家礼》成书问题的论说会走到成书真伪的怀疑上。不过,随着具有国家礼制色彩的《家礼》性理大全本的颁行,《家礼》的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明中期以降,儒士们尽管会不满意《家礼》的礼文仪节,甚或尝试改编修订《家礼》,但他们已不再在《家礼》的成书问题上大做文章。就连丘濬的《家礼仪节》也只是在小字底注中用小段文字摘录批驳应氏的说法而已。进入清康熙年间,儒士之间又开始兴起一股批评《家礼》的新潮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现的批评《家礼》潮流研究,可参Chow Kai-wing,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4)。王懋竑“独创”《家礼》非朱子书之说,可以说正是这股批评潮流的产物。

二、《家礼》与《书仪》之比较

早在《家礼》成书之前，司马光私撰的礼书《书仪》便已行世。朱熹也有意借鉴古今官私礼书撰写家礼，尤其是《书仪》。两书的文本异同自然引发学者们比较的兴趣。人们主要从《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家礼》的承袭创新与务实易行两方面讨论《家礼》的先进性：

第一、《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翻阅《书仪》和《家礼》，人们很快会被二者“影堂”与“家长”、“祠堂”与“宗子”的设计所吸引。日本学者牧野巽（1949，1980）依据《书仪》“家长”、“影堂”与《家礼》“宗子”、“祠堂”、“祭田”、“墓田”的重要差别，结合《续文献通考》载述的历代累世同居事例的数据与唐宋士人阶层、宗族形态、宗法理念变动的事例后，大胆提出：《书仪》代表同居共财的“大家族主义”，《家礼》代表祖先祭祀为核心的“宗法主义”，宋代正是《书仪》“大家族主义”盛极而动转向《家礼》“宗法主义”的时代。牧野氏的观点简洁明快，发人深省。他抉发的“大家族主义”、“宗法主义”对立的观念和宋代从“大家族主义”向“宗法主义”转型的图式，在卢仁淑（1983，2000）、伊沛霞（1991）对《家礼》的文本分析和佐竹靖彦（1973）、小林義廣（1990）对宋代累世同居大家族的实证研究中得到积极响应。与之相比，大陆学者似乎没有受到牧野巽的影响。杨志刚（1993、2001）、王立军（2002）虽然体会到《家礼》的宗法色彩、宗法设计远较《书仪》浓重完备，却依然将宗法理念视为二者贯通的精神，亦将其视为宋代兴起的平民阶层与士大夫政治的共同需要。

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不知不觉”与批判牧野巽的学者们的“后知后觉”颇相契合。水口拓壽（2000）、佐佐木愛（2005）、吾妻重二（2005）先后进入《书仪》、《家礼》的文本世界与司马光、朱熹的宗法理念，检视“大家族主义”、“宗法主义”对立的观念。水口拓壽看到《书仪》与《家礼》两书在收族构想上目的相同、方法相似，觉得“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表里一致”。佐佐木愛聚焦司马光在濮议、宗室改革中的宗法言论，感觉他的宗法理念与朱熹非常接近。吾妻重二细读构成牧野巽立论根基的《书仪》“家长”与《家礼》“宗子”的相关段落，发现两书设计的“家长”与“宗子”蕴有多层意涵，某些层面是彼此相容而非完全对立的。他们基本都认定，《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实具共通性。小島毅（2005）甚至认为，《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的对立并非宗族形成的当事者的自身观感，而是近代研究者的概括分类。即使大家族与宗族的机能存在差异，但就当事者而言，二者始终都被视作为“家”。师琼佩（2002）正是从“家”的立场上理解《书仪》与《家礼》，勾画汉唐以来“祠堂”与“影堂”历史。她的研究显示：源自唐代纪念供奉高僧大德的影堂祭祀，两宋时期成为民间主要的祭祖习俗；溯至战国的祠堂祭祀在宋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祭祖仪式。宋元明初，“影堂”祭祖与“祠堂”祭祖一直同时并存。远藤隆俊（2005）、井上徹（2005）在各自总结近世宗族研究的成果时，都异口同声地言明宋代以后“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的历史并存性。张文昌（2006）详考唐宋官私礼书的修撰史，指出《家礼》为代表的宋代家礼类礼书的编修实反映宋代科举与平民社会的需求。不过，诸学者的批判意见也引起中島榮章（2006）的反批判。中島认为，“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固然不能对立看待，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二者的相似性，更不能无视北宋累世同居现象最发达的江南东、西路到南宋元时期成为宗族形成趋势最活跃地区

的历史事实。

透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自牧野巽伊始，学者们便已尝试越过《书仪》与《家礼》仪节礼文的文本差异，探讨两书的理念异同及其实践的历史脉络上。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理念是对立还是共通；《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实践是转向还是并存。这两点可以说都是围绕牧野巽的创见展开的。

《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理念是对立还是共通。牧野巽发明《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理念对立的史料依据，主要是《书仪》“家长”与《家礼》“宗子”的礼文差异。吾妻重二、水口拓壽、佐佐木愛分别通过重读史料与重构理念对此展开批判。吾妻重二重读牧野氏使用的《书仪》“家长”与《家礼》“宗子”的相关史料，发掘出二者多层且相容的意涵。这确实能够纠正牧野巽将“家长”与“宗子”简单抽绎为对立的“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的观点。不过，如果继续深究“家长”与“宗子”多层意涵在《书仪》与《家礼》中的轻重主次的话，牧野氏的说法似乎仍有其合理之处。水口拓壽、佐佐木愛的论证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即便司马光与朱熹具有相似的收族构想、相近的宗法理念，也不能证实他们不会在《书仪》与《家礼》的具体设计上各有偏重。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无论是穷尽内部仪文重读还是外部理念重构，似乎都只能说《书仪》与《家礼》都曾虑及“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而不能否定《书仪》偏重“大家族主义”、《家礼》偏重“宗法主义”的倾向。相对来说，小島毅的批判更具学术牵引力。他将比较《书仪》与《家礼》的视域从文本写作层面延伸至文本传播与实践层面。这恰好是《书仪》与《家礼》比较以前常常忽略、今后需要加强的地方。不过，我们考察的对象不应泛指身处宗族形成的当事者对大家族与宗族的观感，而是实指身处《书仪》与《家礼》实践过程的当事者如何理解《书仪》与《家礼》的异同。之所以强调考察对象的不同，跟牧野巽及其后学在《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实践是转向还是并存的讨论大有关系。

《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实践是转向还是并存。牧野巽主张宋代是从《书仪》“大家族主义”盛极而动转向《家礼》“宗法主义”时代。他的主要理据是，宋代累世同居的大家族数量最多与北宋中期宗法实践的兴盛。后学们都选取宋元累世同居的大家族案例检验牧野巽的转型图式。牧野巽及其后学似乎都是将“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从《书仪》与《家礼》中抽离出来，再置入宋元甚至更长时间的时空中观其流变。他们主要关注“大家族主义”与“宗法主义”两种理念的实践，根本没有考虑实践的案例是否同《书仪》、《家礼》有关。这种讨论可能在概观宋元同族结合模式上有些许意义，但与《书仪》、《家礼》的流传与实践本身无涉。我们要论析《书仪》“大家族主义”与《家礼》“宗法主义”实践的异同及其意义，也应该是放在《书仪》与《家礼》的流传与实践上予以分辨。

第二、《家礼》的承袭创新与务实易行。“家长”与“宗子”、“影堂”与“祠堂”等只是《家礼》与《书仪》众多文本差异之一。如果我们细细品读《家礼》的仪文，会时时遇到它们同《书仪》相同、相似或相异的地方。卢仁淑（1983，2006）逐章详读《家礼》后认为，《家礼》的设篇次第、冠昏丧礼本诸《书仪》而有所损益。上山春平（1986）仔细比对《家礼》与《书仪》，得到的结论是：《家礼》在篇章结构与卷首通论上踏袭修正《书仪》，而在冠昏丧祭四礼上承袭简化《书仪》。伊沛霞（1989，1991）详审《书仪》与《家礼》的

书写风格、设想读者、礼俗态度、仪节文字后指出：《书仪》设想的读者是士大夫，《家礼》面对的则是有心行礼的士人与推广教化的地方官。《家礼》一书正是以《书仪》为蓝本，简省其仪节、剔除其考辨，再掺入程颐和朱熹自己的发见而成。朱子在仪节上的简省创新和在书写上采用纲目体，都是为了达到《家礼》的“易晓而易行”。杨志刚（1993，2001）、小島毅（1996）、王立军（2002）、粟品孝（2004）亦留意到《家礼》对《仪礼》、《书仪》的承袭、简省与创新。他们普遍认为，朱熹考虑时代现实，折衷古今礼俗，采取简约可行的原则编撰《家礼》，目的正是要凸显《家礼》的务实易行。不仅如此，学者们还试图从朱熹所处的时代风俗及其本人的家礼活动证明《家礼》的务实易行。李丰楙（2002）、安国楼（2005）结合朱子的礼学主张与《家礼》仪文，强调《家礼》的变通与时宜。即便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家礼》的某些仪节，朱子自己都没有付诸实践。如伊沛霞（1991）和粟品孝（2004）都先后发现：朱子并未没有实现《家礼》拟设的“祠堂”构想。但粟坚持辩称，原因只是《家礼》的“祠堂”部分实已遭人改易。

《家礼》对《书仪》的承袭创新只需翻对仪文，即可觑得分明。当然前提是我们要确信翻对的《家礼》与《书仪》仪文都出自朱熹与司马光的手笔。但《家礼》仪节是否切实易行，则毫无疑问不能仅由朱子自身推知。肯定此点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同情”《家礼》与朱熹的立场上理解《家礼》的承袭创新。或许正因为被“同情”感包围，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后世不少儒士都或明或暗地抱怨《家礼》的诸多不便，许多践行家礼的儒士也并未感觉《家礼》远胜《书仪》，而是兼而采之。要理解《家礼》对《书仪》的承袭创新与切实易行，我们还需要将它们放诸后世家礼的流传与实践之中深度观察。

归根结底，强调《家礼》理念与仪节先进性的学者们都不切实际地将《家礼》超越《书仪》、从众多礼仪系统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片面归结为朱子的远见卓识和《家礼》的文本优越，而没有深切认识到它是国家礼制、地方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动调适与朱子学的尊奉普及、《家礼》的刊刻流传、儒士们的效仿实践等等因素长期互动的历史结果。我们考察《家礼》与《书仪》甚至《仪礼》等礼仪系统的关系，固然要比较它们的文本差异，分析它们的理念与仪节差别，但更应该深入具体仪文，透过文本差异从身处多重礼仪系统中的儒士们具体性的家礼主张、实验性的家礼实践去体察它们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历史过程。

三、《家礼》文本之传布

《家礼》自嘉定四年广州初刊以后，陆续出现众多的翻刻本、改编本，《家礼》仪文亦先后被纳入国家礼制。正是这些形式、性质、内容不一的《家礼》文本“群”的传布，帮助儒士接触、了解《家礼》，影响他们理解、实践《家礼》。《家礼》文本之传布亦成为《家礼》研究中相当重要的领域。学者们主要从考镜《家礼》版本的源流异同、重绘《家礼》文本的传播轨迹、聚焦《家礼》文本的创造实践三种视角探讨《家礼》文本之传布：

第一、考镜《家礼》版本的源流异同。中国版本目录学家们很早便注意著录见闻的《家礼》刻本，运用版本目录学的眼光考订其源流异同，甚至其成书之真伪。可惜他们的著录与考订都太过简略。较早系统考镜《家礼》版本源流、辨章版本异同的是日本学者阿部吉雄（1936）。他利用中国学者的《家礼》版本题识与东文研珍藏的《家礼》善本，清理《家礼》宋元刊本与明清翻刻本的传刻系统，比勘宋《文公家礼集注》十卷本与明《家礼》性理大全

本之异同，并试图解决《家礼》成书真伪问题。上山春平（1976）、高明（1982）、卢仁淑（1983）皆沿着阿部吉雄的道路，从《家礼》现存的刻本实物上揣度《家礼》的版本系统。他们的主要共识是，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赵师恕余杭刻本是《家礼》最早的刊本，宋时《家礼》版本已存在五卷正文本与十卷纂图集注本两种系统。宋刊十卷本明以后没有翻刻，五卷本时有翻刻。但明清较流行的《家礼》版本系统不是五卷本《家礼》，而是明儒丘濬改编的八卷本《家礼仪节》。

伊沛霞（1991a, 1991b）令人钦佩地搜罗到大量宋元明清《家礼》刊本及其相关资料。她分别在《家礼》英译本与《中华帝国的儒家与家礼》（*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两书的附录中，胪列知见的《家礼》原本与改编本两大系统的宋元明清刻本。经过伊沛霞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家礼》最早的刊本是嘉定四年（1211）廖德明在广州刊刻的五羊本，《家礼》现存最早的完本是黄瑞节元大德九年（1305年）初刊、至正元年（1341年）重刊的《朱子成书》中收录的《家礼》；《家礼》最早的改编本是元初吴霞举的《文公家礼考异》等等。有关《家礼》宋元版本系统，她慎重指出：《家礼》宋刻原本系统虽不可考，但元刻原本系统至少已发展出五卷正文本、十卷纂图互注本、五卷集注本、十卷增序纂图集注本。《家礼》改编本系统肇自元代，在明清时期日臻繁复。《中华帝国的儒家与家礼》第七、第八两章即专门探讨明清两代的《家礼》改编本。伊沛霞的《家礼》英译本选用的中文底本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至正元年《朱子成书》之《家礼》。她又广收《仪礼》、《书仪》、《家礼》众刻本的相关文句与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相关言论增入英译本正文的底注。

张国风（1992）根据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度藏的《家礼》善本和冀淑英先生考证北图宋本《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实为元本的意见推定，《家礼》宋本主要是五卷本，至元代《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始析五卷本为十卷纂图集注本。明代又有七卷本《文公先生家礼》。张更结合北图馆藏影宋抄配本《家礼》中所见刻工的活动年代与卷末周复的跋文时间，推测此本大约是在淳祐五年（1245年）刊行。王燕均、王光照（1999）在点校《朱子全书》之《家礼》的序言中，对《家礼》的版本系统略有陈述。他们的主要看法是：《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两本重要的目录著作皆书《家礼》一卷，嘉定四年廖德明在广州刊刻的《家礼》是此书最早的刊本，其后有淳祐元年杨复在广州刊行的附注本、陈淳在临漳刊行的闽本，此三本现已不传；现知《家礼》比较明确的分卷系统主要有五卷本、十卷本、不分卷本、七卷本等。五卷本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嘉定九年的杭州刻本，另有萍乡本，两本皆不传；现存最早的五卷本是淳祐元年杨注附录本。十卷本系统晚于五卷本，现存最早的十卷本是元刻《文公家礼集注》本。现存最早的不分卷本是元《朱子成书》本，七卷本则是《家礼》明刻本。他们点校的《家礼》以国图馆藏的影宋抄配《家礼》五卷本为底本，参校国图元刻《文公家礼集注》十卷本、元刻《家礼》朱子成书本，底本清人抄配部分又参校明仿宋刊杨注附录五卷本。书后还附录摘自若干《家礼》刻本、目录著作的序跋、提要、题识等。

吾妻重二（1999, 2004）博采史料细致考述明《性理大全》本以前的《家礼》诸刻本，绘制出明晰的《家礼》版本系统图。他的基本观点是：朱熹时代流行着临漳传本《祭仪》、朱熹家传本《时祭仪》及手抄《家礼》三种同《家礼》有关的文献；自五羊本后，余杭本、严州本等相继出版；朱子门人杨复在朱子死后注释《家礼》，到南宋末年出现基于杨复附注

本的两种版本，即周复五卷本与纂图集注十卷本；此两本成为《家礼》版本的两大系统，现存的《家礼》诸版本皆归属此两大系统，如四库本为周复本五卷本系统，朱子成书本、性理大本及和刻本属纂图集注十卷本系统。吾妻重二不仅娴熟运用版本目录学的技艺推定《家礼》现存宋元刻本的年代源流，而且为《家礼》成书问题寻到新的文献线索。如他找出《家礼辨》的作者武林人应氏即元末钱塘人应本，《家礼》性理大本卷首“家礼图”的编者即《朱子成书》的编者黄瑞节等。孙华（2009）同样以明《性理大全》本以前的《家礼》诸刻本为对象，踏勘整理《家礼》的传刻系统。她整理出来的传刻系统可概括为，《家礼》原稿本与早期刊本广州本、临漳本、余杭本、潮州本皆分五篇不分卷，至以余杭本为底本的萍乡本、以广州本为底本的杨注附图本始分五卷；杨注附图本后衍生出刘垓孙增注十卷本、刘璋补注十卷本、刘璋补注七卷本；宋刊十卷本明代以来没有翻刻，宋刊五卷本系统明清时有翻刻，流传甚广；明丘濬《家礼仪节》八卷本改编自《家礼》五卷本，且取代其成为明清最流行的《家礼》版本。

由此可见，随着研究成果的累积，学者们已大致掌握考镜《家礼》版本的四类基础文献：朱子亲炙门人的笔述、《家礼》众多刻本的序跋、《家礼》现存刻本实物与版本目录学著作。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早已展开，除上文提及的《家礼》英译本、点校本的出版外，国图影宋抄配五卷本《家礼》与元刻十卷本《文公家礼集注》的付梓、东文研宋残本《文公家礼集注》的公布、吾妻重二（2010）《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1》的编录都令人振奋。不过，或许是因为受到传统版本目录学的影响，与《家礼》有关的包括族谱、科仪书等在内的民间文书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同需要更勤力地、更客观地搜集整理基础文献相比，目下的主要问题是学者们在解读文献时常常不经意流露出阅读史料浮泛、迷信版本目录学著作的毛病。阅读史料浮泛的典型例子是《家礼》临漳本。许多学者相信，陈淳刊刻过《家礼》临漳本。这完全是对陈淳《代陈宪跋家礼》中“临漳传本”的误读。只要稍稍认真阅读陈淳的跋文，即可知晓：陈淳口中的“临漳传本”只是绍熙元年（1190年）陈淳在临漳从朱熹季子朱在手中得到的《时祭仪》一篇。再比读陈淳的《家礼跋》，益可确定“临漳传本”亦非吾妻重二所说的“临漳传本《祭仪》”。版本目录学著作虽说成诸著名的藏书家或专业学人之手，可它们并非都是不可撼动。何况众人的识鉴亦有相左，如国图藏《文公家礼集注》十卷本即有宋本、元本之争。但学者们在征引有关《家礼》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时，大多只是逐字过录，鲜有人像吾妻重二那般踏实查考。换言之，《家礼》版本源流异同的考镜尚余相当大的讨论空间。

第二、重绘《家礼》文本的传播轨迹。《家礼》能够跨越时空、阶层成为东亚近世的重要礼仪范本，与其文本传播密不可分。将文本传播引入《家礼》研究的是稻叶岩吉（1933），他考察的是丽末鲜初《家礼》东传朝鲜的问题。较早系统研究《家礼》在中国近世社会传播的则是伊沛霞（1991b）。伊沛霞体察到，《家礼》在中国近世社会的传播过程不仅是儒士大夫与王朝国家共同推动的正统化过程，而且是《家礼》的正统礼文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她非常细致地把捉到《家礼》传播过程的关键节点，包括宋元朱子门人主导的《家礼》传播、元明清政治力量的助推、明代士大夫的《家礼》实践、《家礼》与近世宗族祭祀及明清《家礼》改编本，分层描绘出中国近世社会《家礼》文本的传播过程。杨志刚（1994）亦感觉到，《家礼》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原因在于官方有意识的尊崇与民间《家

礼》注本、传本的大量刊布。他依照宋元、明、清三个时段从官方尊崇与民间《家礼》刊布两方面简略例证了《家礼》的推广过程。李丰楙（2002）尝试切入闽台社会，从具体的地域脉络中理解《家礼》的传播过程。在他看来，《家礼》首先行之士人之家，受朱子学熏染的闽士分别编出各适其地的家礼通俗用书，如吕子振《家礼大全》、张汝诚《家礼会通》之类。继此之后，民间礼生及其团体又依《家礼》而倡行于社会，其有关吉礼、祭礼者，以儒家之礼为主，亦兼容各地之俗，礼与俗的相互适应，表现士人之从俗而在基层社会中维持其主导的职能。刘永华（2004）更是由晚清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直接入手，深度分析他们的礼仪实践与礼仪文本，试图揭明明清时期礼仪与习俗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朱子家礼》为核心的宋明社会伦理与祭祀仪式如何通过礼生对地方文化影响的产生过程。森田宪司（2004）以最早吸纳《家礼》的王朝典制至元八年婚制为中心，比勘《元典章》、《通制条格》、《家礼》及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翰墨全书》、《居家必用》等的元刻本所载的相关条文进行详细的文字校异，并简单推测诸书刊行的先后关系。赵克生（2010）认为，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的推动外，端赖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他利用现存的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家礼》礼书编修、礼图编刻与礼仪展示三种传播途径，通过举隅的方法，意图揭示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过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学者们的研究在在彰显出《家礼》的传播是朝着两个相互作用的方向前进的：向上升入国家典制、向下流入地域社会。在向上升入国家典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与《家礼》有关的典章礼文及其背后的人物包括皇帝、中央官僚、地方官员、朱子学人、儒士大夫甚至升斗小民，文本包括《家礼》刊本、奏稿、公文、辩词，还有人物、文本、政局等交织构成的具体事件。但截至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洪武礼制与嘉靖庙制改革稍稍有所探测外，其他几乎都只是一笔带过。在向下流入地域社会的过程中，情况更为复杂。众多的文本包括国家典制、儒家礼经、《书仪》、《家礼》刻本、家礼图、先儒成说甚至礼仪展示，众多的人物包括地方官员、学校教官、不同层次的儒士、民间礼生、僧道淄流、农工商贾，众多的空间包括家庭、宗族、学校、乡村、州县，还有众多的思想包括不同的儒家学派、三教理念、地方传统等等。可惜既有的研究除闽台礼生的研究外，其余基本都停留在举例说明的层次上。大量的地域个案或文本个案研究可以期待。

第三、聚焦《家礼》文本的创造实践。诸种形式、内容不一的《家礼》文本是《家礼》文本传布的重要载体。它们都凝聚着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个体面对《家礼》文本传统与时代课题的思考与行动。聚焦《家礼》文本的创造实践亦成为探究《家礼》文本传布的重要一环。伊沛霞（1991b）搜寻到66种嵌名“家礼”的元明清《家礼》改编本的资料，在《中华帝国的儒家与家礼》中专辟两章不仅重点讲述资料较翔实的明清《家礼》改编本的众多细节，包括改编者的生平言行、著书经过与改编本的内容主题、刊刻流传，而且观察总结不同时期的《家礼》改编本的内容特征。她的观感是，15世纪《家礼》改编本在尊重朱熹《家礼》原文、明朝国家礼制的同时也努力追求简省易行；16世纪则流行大量“从俗”的《家礼》简写本；17世纪开始兴起反省批判《家礼》的《家礼》改编本。伊沛霞对明清《家礼》改编本的

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极具典范意义。梁勇（2006）集中研究明代几种冠名“家礼”或“四礼”的《家礼》注释书。他尝试通过对这类《家礼》注释书的评析，探究明人《家礼》诠释模式的变迁。陈瑞（2007）运用明清徽州丰富的地方志与族谱资料，从宗族的立场上详细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围绕《家礼》的制度设计与以礼治族的实践。赵克生（2009）以明代东山葛氏为个案，透过重建葛氏的家族历史、考订葛氏《家礼摘要》的撰述与实践，试图阐释16世纪后期儒士借助家礼营造有利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构建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以图达到家族整合的努力。何淑宜（2009）不仅细密考察了浦江郑氏《郑氏家仪》、《性理大全》本《家礼》和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编者背景、内容主张和制造过程，而且还结合时儒和后儒相关的论礼、践礼行为讨论这些《家礼》文本与人们日常生活及实践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基本都是立足具体的《家礼》文本，关注儒者与《家礼》文本书写、文本书写与宗族实践之关系，揭明文本创造过程与仪节实践意义。他们关注的《家礼》文本也已经由后朱子时代的重要《家礼》改编本扩展至国家礼制、方志族谱中的《家礼》文本，向不同形式的《家礼》文本迈进。但目前除冠名“家礼”的《家礼》改编本的个案研究与类型分析稍稍成熟外，其他形式的《家礼》文本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四、《家礼》祠堂制度的推行与祭祖礼仪的展开

《家礼》祠堂制度的推行是中国近世宗族形成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亦主要由研究宗族史的学者们推动展开。他们基本从祭祖礼制变动与地方士大夫践行两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祭祖礼制的变动。常建华（1993，1998，2001）、井上徹（2000）、吾妻重二（2001）、科大卫（David Faure，2003，2007）、杨建宏（2005）、赵旭（2008）、何淑宜（2009）等研究表明：北宋庆历元年、皇祐二年、大观四年曾三次讨论家庙制度，形成皇祐二年、大观四年两种礼制仪文。至南宋绍兴十六年，又在大观四年文本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完善的家庙礼制。这几套家庙礼制规定可能都曾得到执行落实，但次数甚少。朱熹为适应民间需要与抗衡佛教礼俗撰写《家礼》，主张士庶设置“祠堂”祭祀四世。祠堂之制的重点是小宗之法，但不否认复活大宗。明洪武三年（1370年），徐一夔等人修成《大明集礼》。《大明集礼》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定立庙制，规定品官之家立祠堂祭祀四代，。它既褫夺了庶人祠堂祭祖，又否认了宗法原理。士大夫对这套礼制并不满意。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言，三品以上官员祭祀五世祖先，始祖、先祖临时祭祀，立庙官员将来“世祀之”；三品以下官员依旧祭祀四世祖先；大小官员皆可立庙。尽管夏言的建言是否为嘉靖皇帝接受不得而知，且没有进入其后编订的礼典，但它客观上为士庶合法建立祭祀始祖的宗祠提供了契机。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宗祠、祭祀始祖的祭祖仪式在地方社会中其实早已践行。常建华（1998）和吾妻重二（2001）皆据实例揭明：元代已经出现祭祀始祖的祠堂。因此，我们在掌握祭祖礼制变化的同时，还需要深入地社会，具体而微地把握其践行的实态。

第二、地方士大夫的践行。郑振满（1987）、小岛毅（1996）、常建华（2001b，2005，2006）关注《家礼》祠堂制度在福建的流传。他们的研究显示：《家礼》刊行不久，福建仙游、建阳即出现依《家礼》祠堂制度而建的祠堂。这种形式的祭祖礼仪与家祭、墓祭和其他类型的祠祭并行流传。明初部分士大夫接受《家礼》的祠堂制度。成化以降，已有部分士大夫突破《家礼》的束缚，祭祀始祖。明嘉靖年间，人们将宗族组织视为维护地方秩序支柱的

思潮普遍兴起。宋怡明（Michael Szonyi, 2002）关注明中期以来福州地区的宗族构造：当地人群在重修祖墓、创设祠堂表达自身的汉人身份的同时，又将地方神祇和民间俗节整合纳入祭祖礼仪。铃木博之（1994）、赵华富（1997）、常建华（2001a）都注意到明代徽州嘉靖、万历年间普遍存在的宗祠。这种以始迁祖为“宗”的宗祠既不同于《家礼》的祠堂制度，亦不同于明初的庙制。它是徽州地域神崇拜、新安学者的祭礼主张与嘉靖十五年的礼仪改革共同作用的产物。常建华（2005）对元明江西吉安府的宗族祠堂进行统计分类后指出：元代吉安已出现依《家礼》祠堂建置、却祭祀始祖的祠堂，明初的祠堂比较遵行《家礼》的祠堂制度；成化以后的祠堂大多是祭祀始祖的大宗祠。他从明代吉安士大夫的祠堂记文中读到相同的趋势：明初的吉安士大夫比较肯定《家礼》的祠堂制度，成化正德年间主张以《家礼》规范祠堂，嘉靖以降则是自觉认同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和社会上普遍兴造的宗祠。井上徹（2000）以宋代的范氏义庄、元末明初的浙江、明代的苏州为对象探究江南社会宗族形成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宋代宗族的登场是适应科举官僚制度的结果。元末明初，重新进入中央政府的江南士大夫开始采行《家礼》祠堂制度，形成以宗族为单位的名门宗族。但这种动向因明初对江南士大夫的镇压而中断。嘉靖十五年的夏言奏疏促使苏州地区宗族形成的再次进行。科大卫（2003, 2007）立足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重现宋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祠堂历史：宋代虽然已有官员刊行《家礼》，但直到明初这一地区仍然没有一座依《家礼》建造的祠堂；明代前期，家庙式的祠堂比较罕见，族谱编撰渐趋普及，这与明初的里甲登记有关；明嘉靖礼仪改革后，家庙式祠堂逐渐普及，地方上的乡族组织以宗族形式扩张。家庙式祠堂在地方上的普及和正统化过程，同时也是士人在乡村中的地位合理化过程。

在宗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在具体的时间序列和地域空间中交会的两股潮流：一种是士大夫在国家政治中推动国家礼制不断采纳又不断扬弃《家礼》祠堂制度的潮流，一种是士大夫在地域社会中不断接受又不断突破《家礼》祠堂制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共同指向的正是《家礼》祠堂制度推行的历史。

《家礼》祠堂制度的相关研究已透露出，不同地域的儒士在践行《家礼》祭祖礼仪时，直面的不只是《家礼》仪文与国家礼制，更有地方时俗的压力。与他们主要从宗族的立场出发不同，部份学者从风俗的立场出发研究祭祖礼仪的展开。他们主要关注《家礼》祠堂制度进入儒士生活之前早已流行的墓祭、功德寺、坟庵等民间祭祖风俗。对此既有专题论述，如伊沛霞（1986）、宋三平（1989, 1991）对唐宋墓祭的讨论，黄敏枝（1989）、竺沙雅章（2002）对宋代功德寺的论说，宫本则之（1992）对宋元坟庵的探讨；又有综合研究，如伊沛霞（1991b）、常建华（1998）对宋元明清各种祭祖形式的全景鸟瞰。学者们不仅重点讨论祭祀场所与空间，而且还旁涉祭祀时间、祭祀对象、人群构成等等祭祀细节，生动呈现《家礼》祭礼展开的时代风尚、社会土壤。有此基础，我们便可以重现《家礼》祭祖礼仪在这些祭祖习俗中展开的历史，审视个中意义。何淑宜（2009）即循此思路，一方面勾画元人各种祭祖风习，另一方面探究元儒践行《家礼》祭礼的案例及其与他们自身的定位、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之关系；一方面关注明初具有国家礼典色彩的《性理大全》本《家礼》与民间范本的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制造传播过程，另一方面拈出明中后期祠堂记的写作与王学士人的祠堂建设，揭示元明时代《家礼》祭祖礼仪如何在民间推展与扩散。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常常会过度依从《家礼》祠堂之制与祭祖礼仪深入民间的后见之明，采取“倒放电影”的方法重构其过程。

结果常常会忽略实践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甚至“逆流而动”的因素，造成在解读史料与论证结论上的偏差。而且，《家礼》祭礼礼仪与民间习俗之间关系非常复杂，既有明显的冲突，又有隐晦的依违，更有变相的结合。我们似乎应当超越二者对立的观念，深入不同传统的地域社会，考察不同身份的个体祭祖活动的复数历史，进而认识《家礼》祭祖礼仪实践的复杂展开。

结语

笔者在正文分疏《家礼》成书之真伪、《家礼》与《书仪》之比较、《家礼》文本之传布、《家礼》祠堂制度之推行与祭祖礼仪之展开等四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现状时，已经尝试逐一指出既有研究值得称述与可资修正的研究观点、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下面拟就《家礼》研究的未来整体方向谈两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加强《家礼》研究的文献整理。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要深化《家礼》研究，我们需要全面搜集整理《家礼》研究文献，弄清相关史料的边际与厚度。《家礼》研究文献不仅包括《家礼》文本流传与仪节实践中形成的诸种《家礼》版本，如《家礼》原刻本、《家礼》改编本、礼典中的《家礼》、文集集中的《家礼》、日用类书中的《家礼》、族谱中的《家礼》、科仪书中的《家礼》、家礼图等；而且还包括不同个体认识、接受、讨论、践行《家礼》文本的各种遗迹，如《家礼》版本题识、《家礼》主题讨论、《家礼》实践事迹等。所谓整理《家礼》研究文献亦不是校出某种《家礼》版本的完美定本或搜寻遗迹的重要一角，而是原原本本地呈现各种风貌的《家礼》版本与各种样式的遗迹。目前只有少量的《家礼》原刻本、改编本及其题跋得到影印、校异、翻译，《家礼》研究文献的整理工作任重道远。

第二、拓展《家礼》研究的问题空间。问题是研究的动力。要推动《家礼》研究，我们需要大力拓展《家礼》研究的问题空间，不断挑战相关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所谓拓展《家礼》研究的问题空间，一方面是指《家礼》研究既有问题的细化、延伸或转向，正如笔者在正文对《家礼》四个研究问题的修正意见；另一方面则是指发现《家礼》研究可行的新问题。以《家礼》仪节实践为例，人们主要关注丧祭礼仪，鲜有人注意到冠礼、婚礼。但据笔者所知，冠礼虽然在近世鲜有流行，但冠礼的一个仪节“字说”却是近世士大夫们热衷书写与讨论的对象，婚礼中的婚资亦能引发社会史、法律史与妇女史的新思考。只有在全面细致梳理《家礼》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贯以更具深度与广度的问题意识，《家礼》研究才会鲜活地走入我们的历史。

征引论著

安国楼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蔡方鹿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常建华 《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收入《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1年

《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

- 华书局，2001年
-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
- 《明代墓祠祭祖述论》，《天津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
- 《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朱熹佚文より見た〈家礼〉祠堂篇と宋代の祠廟祭祖》，收入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 《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 陈 来 《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 陈 瑞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 高 明 《朱子的礼学》，《辅仁学志》第11期，1982年
- 何淑宜 《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
- 黄敏枝 《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
- 科大卫 《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2003年
- 李丰楙 《朱子〈家礼〉与闽台家礼》，收入杨儒宾主编：《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
- 梁 勇 《明代的〈家礼〉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6年博士论文
- 刘永华 《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2期，2004年
- 卢仁淑 《〈文公家礼〉及其对韩国礼学之影响》，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1983年博士论文
- 《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钱 穆 《朱子之礼学》，收入氏著：《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
- 师琼佩 《朱子〈家礼〉对家的理解—以祠堂为探讨中心》，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2年研究生学位论文
- 宋三平 《试论宋代墓祭》，《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 《宋代封建家族的物质基础是墓祭田》，《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 束景南 《朱熹〈家礼〉真伪考辨》，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朱熹〈家礼〉真伪辨》，《朱子学刊》1993年第1期
- 粟品孝 《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 孙 华 《朱熹〈家礼〉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 王立军 《宋代的民间家礼建设》，《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 王燕均、王光照 《校点说明》，1999年，载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之《家礼》，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杨建宏 《宋代家庙制度文本与运作考论》，《求索》2005年第11期
- 杨志刚 《〈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

- 《论〈朱子家礼〉及其影响》，《朱子学刊》1994年第1期
《朱子家礼：民间通用礼》，《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朱子家礼〉与中国礼学的若干思考》，《》
- 张国风 《〈家礼〉新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
- 张文昌 《唐宋礼书及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收入黄俊杰编，《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唐宋礼书研究：从公礼到家礼》，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6年博士论文
- 赵华富 《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收入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
- 赵克生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
《修书、科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中国史研究》2010年1期
- 赵旭 《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 钟鸣旦 《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郑振满 《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
- 稻叶岩吉 《麗末鮮初における家禮傳來及ご其意義》，《青丘學叢》第13号，1933年
吾妻重二 《〈家禮〉の刊刻と版本—〈性理大全〉まで》，《関西大學文學論集》48期，1999年
《宋代ノ家廟シ祖先祭祀》，收入小南一郎編：《中國ノ禮制シ禮學》，京都：朋友書店，2001年
《朱熹〈家禮〉の版本と思想に関する實證的研究》，平成12年度～14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2)研究成果報告書，2003年
《〈家禮〉の出版と版本—また〈家禮〉の作者問題について》，收入李四龙、周学农主编：《哲学、宗教与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近世宗族研究における問題點—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義》，收入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
《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1》，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
- 井上徹 《中國の宗族と國家の禮制》，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
《元明の部》，收入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2005年
- 上山春平 《朱子禮學—〈儀禮經傳通解〉研究序說》，《人文學報》41期，1976年
《朱子の家禮と儀禮經傳通解》，《東方學報》54期，1982年
- 遠藤隆俊 《宋元の部》，收入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2005年
- 宮本則之 《宋元時代における墳庵と祖先祭祀》，《佛教史學研究》35期，1992年
- 小島毅 《中國近世ズれんべ禮ノ言說》，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
《宗族を見る手法—一九四〇年代の日本の研究—かり》，收入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2005年
- 小林義廣 《宋代における宗族と郷村社会の秩序—累世同居を手がかりに—》，《東海

大學紀要（文學部）》52 輯，1990 年

- 竺沙雅章 《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增訂版）》，京都：朋友書店，2002 年
- 佐竹靖彦 《唐宋變革期における江南東西路の土地所有と土地政策—義門の成長と手がかりに一》，《東洋史研究》第 31 編第 4 号，1976 年
- 鈴木博之 《明代における宗祠の形成》，《集刊東洋學》71 集，1994 年
- 佐佐木愛 《宋代における宗法論をめぐって》，收入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2005 年
- 中島楽章 《累世同居から宗族形成へ宋代徽州の地域開発と同族結合》，收入平田茂樹、遠藤隆俊、岡元司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2006 年
- 牧野 巽 《司馬氏書儀ノ大家族主義シ文公家禮ノ宗法主義》，收入氏著：《近世中國宗族研究》，東京：日光書院，1949 年；再刊《牧野巽著作集・第三卷・近世中國宗族研究》，東京：禦茶ノ水書房，1980 年
- 水口拓壽 《“大家族主義” 对“宗法主義” 一牧野巽氏の中國親族組織論を承けて一》，《中国哲学研究》第 14 号，2000 年
- 森田憲司 《元代類書における〈文公家禮〉の引用：至元 8 年婚姻礼制所引を中心に》《奈良史学》22 期，2004 年
- 阿部吉雄 《文公家禮に就いて》，收入《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東京：富山房，1936 年
- 兼永芳之 《朱文公家禮ノ一考察》，《支那學研究》21 期，1958 年
- 樋口 勝 《〈文公家禮〉ノ成立ズコゆサノ一考察》，《東洋ノ思想シ宗教》4 期，1987 年
- 細谷恵志 《朱文公〈家礼〉の真偽説をめぐって》《文学研究》16 期，2001 年
- 呉 明熙 《朱子〈家禮〉成立の背景とその特質—〈朱子文集〉、〈朱子語類〉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哲学》36 輯，2008 年
-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sto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 *Education Through Rituals: Efforts to Formulate Family Rituals During the Sung Period*,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Century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作者简介: 周鑫,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博士后。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ou xin

Abstract: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was among the best-known boo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Many schola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On four topics: Chu Hsi's authorship of the *Family Ritual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mily Rituals* and *Shu-i*, circul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 *Family Rituals*,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on the Offering Hall and Ancestral rites in the *Family Rituals*. The article is to provid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tudy and fore-sighted outlook so as to offer more valuable reference material for scholar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Family Rituals*.

Keyword: *Chu Hsi's Family Ritual* circulation and diffusion of texts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on rites Offering Hall Ancestral rites